

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救亡

鲍劲翔

内容提要 战国策派是个深受误解的文化学派,它在贝塔朗菲之前就运用系统方法——“文化摄相”法审视现实,思考问题,研究社会科学;它清醒地看到了五四启蒙理性的弊端,力倡“反理性”的人本主义,以突破僵死“理性”的桎梏。而其目的是博采并蓄地融合中西文化,建构理想人格,创造民族新文化。

关键词: 战国策派 文化救亡 系统方法 反理性主义 民族新文化

战国策派是1940年,因林同济、陈铨、雷海宗、沈从文、贺麟等人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的一个综合性文化学派,由于曾受到“革命文艺界”“集中火力”^[1]的批判,以至50多年来,整个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一直对这一学派缺少应有的研究,简单地把它视作“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一股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逆流”^[2]而全面否定。笔者认为,作为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战国策派,固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绝不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逆流”。

五四主潮是全面引进西学,彻底批判传统。然而其内部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对民族传统的根本否定,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对民族自身的根本否定。这显然与追求民族生存发展宗旨背道而驰。在科技落后、经济不发达情况下,中华民族既然无足够的科技、经济实力与西方竞争,那么就更加需要依赖于民族精神力量的发扬。如果将自己的传统全部放弃,则必然失去民族共同体内在认同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又凭什么去与列强竞争呢?它追求民族独立解放

的力量源泉又在何处呢?《学衡》派看到了这个问题想作些纠正,结果却遭到误解、曲解,挨了先驱们一顿棍棒而“败下阵来”。新月派作过不少努力,也遭到左翼文化阵营的围攻。对此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还没有给人以满意的回答,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踏进了中国的腹地。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大穹下出现了“真空”。迅速弥合“五四”造成的文化断裂,重建民族文化,确立全民族的共同信仰,成为有识之士呼之欲出的强烈愿望。1935年1月,上海十教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3]醒目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西学中的困惑和忧虑,激起了一片共鸣。国民党统治阶层很快就接过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旗帜^[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进步文化界也发起了“新启蒙运动”^[5];战国策派则毫不犹豫地肩起了民族救亡和文化重建的双重重担。在林同济疾呼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抗击日寇的同时,陈铨也断喝:“假如中国人不采取一个新的人生观,不改变从前满足、懒惰、懦弱、虚伪、安

静的习惯,就把全盘的西洋物质建设,政治组织,军事训练搬过来,前途怕也属有限。况且缺乏这个内心的新精神,想要搬过西洋外表的一切,终究搬也不过来!”^[6]

战国策派的“精神救亡”主张有其显著的独特性。

一、系统论思维方法

科学史证明,科学理论的突破,往往是以方法论突破为先导。一种新的思维方法的形成,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和旧理论体系的扬弃。西学引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分析的、逻辑的、辩证的方法,替代了传统思维直观的体悟的方法,改变了中国人所“看”到的“世界图景”,使现代中国人所感受、所认知、所理解的外部世界大大改变。

系统论的方法早已被世界接受。今天,人们只知到它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非在1945年针对生物学中机体论与机械论的争论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思维方法,直到1968年《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才首次得到全面表述和推广。但是人们却不知道,早在1940年,战国策派不仅提出了这种方法,而且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广泛地加以运用。1940年11月1日,林同济在《战国策》第14期上发表了《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该文指出:从五四到抗战,中国的学术经历了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经验事实”时代。从民国八年到十八年,以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开山之作,上承“考证传统”,外接“经验主义”,抱着所谓“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一种迫近机械的实验派方法,先标出种种个别的、零星的、以至暗昧的“问题”,到处搜罗有关的“事实”或“材料”,然后再类别之、分析之、考据之、论断之,其功绩在扫荡千年道学淫威,棒出冷酷的“事实”来打碎那鳞甲千

秋的“载道”“设教”的老偶像。弊端是只见树不见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第二时期——从民国十八年至今(即1940年。笔者注)“为辩证革命阶段”。以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研究》挑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标志,初次尝试了“认识中国社会整个轮廓”。“只可惜一般参战之士,不是弊于政治的成见,便是有囿于舶来的衣钵,在肯定了认识全体为必要之后,却偏又碍于一种命定式的因果论,硬把‘全体’两字缩化为‘唯物’——局部,把社会轮廓一词,差不多缩化为经济结构的别名。”

“经验事实”只能见其“点”、“线”,只知局部的机械相加;“辩证革命”则见其“平面”“偏面”,“得一当十”,死盯着“经济”,认为“抓住经济便是抓住一切”,似乎一部希腊文化史就只有“奴隶制度”四个字,它们都不过是“盲人认象”。因此急需另谋新途。林同济的“文化综合”或“文化摄像”,就是要用纯客观眼光忠实地“体验”出“各局部相互间微妙关系,交流影响”,不断地变换视点,“摆脱空间距离的幻觉,而对于‘全景’中各个事物的相互的关系,可以给予一个比较近实的估量,高者高之,低者低之,大者大之,小者小之,在这高低大小恰得其所的估量中,再摄取出全景的整个母题,综合作用”。林同济称这种“文化综合”方法为中国学术思潮的“第三期”。

对第一、二、三期的特点关系,林文列了这样一个表:

	象征	基念	方法	对象	性质	态度	注点	欲望	意识
第一期	点	事实	分析	原素	自足	无对	形式	自由	个人
第二期	平面	立场	辩证	因果	独动	绝对	利益	斗争	阶级
第三期	立体	体相	综合	关系	互动	相对	职务	共存	民族

林同济认为第一期的“寻找事实”和第二期的“决定立场”都是第三期“认识体相”

的“先驱”和“基础”。前两期不但不应该削弱而且还应该进一步加强。“有了‘点’与‘面’，我们才会想到‘全体’之一物，才有体验到全体的最低度材料。”

林文还提出了“体相”概念。“体相者，构成全体的各个局部相互关系间所表现的一整个母题以及综合作用也。”其最关键的“入门之道”是“相互关系”四个字。他一再强调：(一)全体不是一切局部之和；(二)全体不是某一局部的放大或延长。

“整体不是某一部分所能解释清楚的”，“不是加减乘除问题，乃是灵机神会问题。不是形式的问题，乃是形式中形式外的整个母题。”文化摄相的“相”字“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它是根据‘形而下’的‘骨’‘貌’等等而创得的。……‘相’究竟不是‘骨’不是‘貌’，而是骨貌以外，骨貌总和之上的整个母题，整个作用。……九方皋相马，要相到牝牡骊黄之外，缘故即在这里。”看一看这些话，似乎有点“玄”。反对派也因此讥笑林氏的“‘摄相’的‘相’即‘看相’的‘相’也，据说看相，虽也看你面貌骨骼，但他还要看超乎面貌骨骼之上的神气”，进而贬斥林同济是城隍庙里的看相先生，“以反理性主义来反抗理性主义。”^[7]

这个问题的症结在“灵机神会”。它既不同于感性的直觉，也不同于理性的逻辑思维，而是一种“高远的洞观”，是一种超越单纯感知和逻辑思维而达到表象与本质、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的统一的“感悟”。是超越“经验事实”与“辩证革命”之上的一种对事物“本质”的领略。是哲学上整体的把握。它虽然表面上不一定直接指向概念，却涵蕴着丰富的理性内容，以至能把握事物的本质。现代心理学已能清楚地解释这种现象。这种特殊的心理活动常常以非理性和无意识的形式出现，主体在不自觉、无意识中“感悟”到某种道理，“直观”到了事物就是那个

样子，你平日搜肠刮肚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在偶然的时刻，因一个无意的触媒而幡然省悟，就象阿基米德或牛顿那样惊喜地高呼“我知道了！”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这种“灵机神会”包含着清醒的自觉的对骨貌的认识活动。它于“非理性(其实也不见得)的形式之中包含着理性的内容，于偶然中包含着必然，于现象中包含着本质，于个体体验之中包含着社会普遍性。这是一种在偶然中神会必然，在有限中贪图无限的心理能力，其中充满着偶然与必然、有限与无限，个体与群体的心理辩证法。它集中体现了战国策派强调天才的直观与严谨的系统的统一，生活体验与逻辑法则的统一，整体的、当下的、瞬时的直接把握与理性方法的统一。实质上它提倡的是在形象、逻辑思维之上的更高级思维方式。

战国策派的“文化摄像”方法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方法中重视认识主体悟性的重要性，而且包含了当代系统方法的各个重要构成部分。系统研究的方法将传统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事物的整体性出发，强调系统运动过程中的有序性与动态性，就是把对象看作一个由元素和元素关系的结构形成的系统和更大系统中的元素，从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系统和环境的相互关系之中来把握事物整体运动过程中的本质与规律。

战国策派运用“文化摄像”法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三维的动态的立体系统。它不仅注意对各个子系统及各元素的细致研究，而且注重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不仅通过不断地变换视点研究对象内部各元素、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来从整体上把握之，而且要“摆脱时空距离”，通过对“全景”中的其它事物比较来综合把握。它相对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它不仅将对象置于历史的纵

的方向来考察,同时又将其置于与其它事物的横向联系的大系统中来考察,因而更能反映出认识对象的本质。

战国策派运用“文化摄像”方法来认识世界、思考世界。他们以“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基准系统单位,下辖两个一级子系统:民族救亡系统和民族文化重建系统。在这两个一级子系统内又辖属着众多的更明细的小系统,战国策派强调“战”、“国”、“策”实际上就是重视该系统整体功能的一种体现。战国策派以系统的方法看待历史,分析局势,引导决策。他们不仅用这种方法预测美国必将“参战”,而且天才般地洞见了“二战”后的“冷战”的基本态势(美国也许需要得英国的同意,利用日本与德国以均衡中国与苏联之势)^[9]。“进步文艺界”不问青红皂白地将之与法西斯主义一起埋葬,不啻是中国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冤案和一大悲剧。

二、反理性的人本主义

作为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新文化,是以理性的思考作为标准和依归的。一切文化,不管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都要用人们的“理智”来裁定,判决,选择,使用。这种启蒙型的理性精神,既是中国数千年来适应环境而生存发展的基本精神的延续,又是西方科学实证精神与中国实用理性整合的结晶。“理性”在中国染有浓郁的准宗教色彩。它与真理、正义等概念同值,而与之相对的“非理性”或“反理性”却被贬斥为失去理智的狂妄意念或不道德的言行。半个世纪以来,战国策派一直被视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10]。

“理性”的概念在当代哲学界颇有争议。一种指与信仰相对的认识能力,是与对神的敬畏,对权威的崇拜相对立,与自发的情感、主观有感觉相对立的人的明智判断、独立思考和自我选择能力。它与启蒙主义的自由、

正义和人性的道德内涵密切相连。另一种是指作为宇宙之体源和世界之灵魂的一种本体论上的实体,是内在于现实中的本质结构,是世界的客观的秩序原则及人们对于这样一种客观秩序进行反思的努力或能力,即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性的哲学观。其目的是致力于展现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研究外在于人的所谓世界最高目标得以实现的方式。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性”观,在反对派思想中是混合于“科学”这一概念之中的,他们认为“反理性”就是反科学,就是丧失理智,就是崇尚蒙昧,迷信,不讲道理,就是法西斯、希特勒的丧心病狂。

战国策派十分推崇叔本华、尼采、郭尔凯戈尔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陈铨率先借浮士德之口说出“感情是一切!”并指出:“德国的狂飚运动,主要的就是反对十八世纪初年的启蒙运动,唯智主义。”他认为:人类固然是理性的动物,但是他们也可以用理智掩护他们的虚假,以达到他们的私谋。冯至也认为:“凭理观察”泯除了主客观的冲突,“说他是抽象的思想吧,它并不能深;说它是主观的意见吧,又没有个性的血气。”^[12]

从《战国策》和《战国》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国策派对“理性”的批判是十分严肃的。其“反理性”的矛头直指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的“客观理性”的神秘宇宙本体,反对理性思维万能和无限适用,是对五四以后“理性崇拜”的一种必要超越和反拨。其“反理性”的目的是要“把作为个体的人从理性设置的所谓神圣的普遍、整体、终极目的等臆造物的重压下拯救出来”^[13],告诉人们“理智不是万能的,只是在事物的有限范围内有适用性。”^[14]在中国,当某一种学说一旦被奉为科学便不准怀疑,不容反思,不许批判,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迷信”。五四运动就是把“启蒙理性”抬到了“科学神”的新

权威和信仰崇拜的地位。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认为这三十年，“科学”这一名词在国内几乎达到了无上的尊严，无论懂与不懂，无论守旧与维新，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梁启超游历欧洲后发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的感叹，在胡适看来，那不过是“几个反动的哲学家，平素饱厌了科学的滋味，偶尔对科学发几句牢骚话，就象富贵人家吃厌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而已。西方学术界中对科学理性的深刻反思被中国进步的思想界整个地忽视了。人们正苦于还没有享着科学理性的赐福，“哪里配反省科学”，于是乎“时间差”加“空间差”的文化隔离，致使中国的启蒙理性依然循着西方弯路蹒跚而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反理性”的战国策派遭到“理性”的进步文艺界批判可谓是历史的不可避免。但今天我们已能看出：理性并不绝对可靠。它太主观，对情感经验整理几乎必然要出错；它太懒惰，一旦从感觉中抽出某种意义，就立刻袖起双手，以为大功告成，结果多半是躺在某条认识的歧路上昏睡不醒。反对派的公式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在其发展向上的时期，都是理性主义的，而当它表现反理性主义倾向转化时，也就表现出了它的没落和崩溃”。十九世纪中叶后，西方资产阶级成了阻碍历史更新发展的势力，“于是在文化上崛起了反理性主义的思想……法西斯思想是反理性思潮的集大成者……我们在实践上以民族自卫的正义战争来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因此我们也要在思想上发扬理性主义来反对反理性主义。”^[15]反对派把现代西方的反理性哲学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对理性与反理性的对立统一、辩证发展，表现出惊人的幼稚无知和粗暴武断。当他们高声谴责战国策派“不学无术”的时候，恰恰暴露了其自身认识的

局限和思想的浅薄。

融合中西、建构理想人格

经过了欧风美雨冲刷的战国策派知识分子们，在看过“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本位文化”后，深深地感到仅仅“拿来”或“打倒”都是不行的，“抗战的最高意义必须是我们整个文化的革新。”^[16]于是他们在国家民族至上的前提下，对被传统腐蚀和战火摧毁的民族精神家园进行了立体的纵深的拓展与重构。他们介绍《浮士德的精神》，《尼采的思想》，《叔本华的贡献》，提出了《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他们谈“儒”论“道”讲“法”品“山水”看“红楼”，无不是进行《中西人风格的比较》。他们歌颂《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重新检讨传统的五伦观念。与五四先驱相比，他们虽不乏浮躁凌厉，却多了些沉静和深入。他们沿着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之路，开掘了更深入的文化心理结构层次。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崩坏，意义结构解体，出现了大片的精神荒原和心理空白，转手贩来的肤浅芜杂的西学，无法从根本上医治人们无所依归、无所适从的精神或心理危机，即信念、价值、存在与形上的迷惘。战国策派从漫长的民族历史中，审视《中国文化与中国兵》，寻找民族的脊梁，总结各民族的历史经验教训，沉思《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探寻着《文化的尽头与出路》。他们面对自己，在抗战广阔背景下剖析知识分子《中饱：官僚传统的一面》，自觉地追求历史感，使现实的腐暗，民族的痼疾，在“历史”的俯视下既显出它全部的荒谬性，又以其厚重的历史惰性力量给人以重压，交织着冷峻酸涩的愤疾、苍凉和悲壮。战国策派既为寻求民族振兴之路苦苦求索，又为重建民族文化精神而披沙拣金。

历史的巨浪把战国策派推到了时代思潮的最前沿，迫使他们“不作传统观念的奴

隶,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17]用崭新的眼光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贺麟在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寻找着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打碎了传统文化的硬壳,揭示了五伦说进展到三纲说的必然逻辑过程。由五伦的相对关系,进展为三纲的绝对关系,“一是因为三纲说要求臣、子、妻尽片面的忠、孝、贞的绝对义务以免陷于相对的循环报复,给你还价的不稳定的关系之中。”^[18]二是因为五常伦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常久关系,进展为三纲阶段就变成了五常德,也就成了维持理想上长久关系的规范。此即康德所谓的人应该不顾一切经验中的偶然情形,而加以绝对遵守的道德律或无上命令。贺麟把儒家传统哲学与西洋哲学相融合,重新建构了自己的新心学的理论体系。《五伦观念的新检讨》就是这一学术思想体系的起点和奠基石,后来的《儒家思想的新展开》、《宋儒的思想方法》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新心学是陆王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的“合金”。贺融合新黑格尔主义整体思维视心为“绝对存在”与陆王的“我心即宇宙”的观点,提出了“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的本体论思想,并承袭发挥了新黑格尔主义的国家学说,把国家的功利观充实到传统儒家伦理理想体系中,形成了战国策派“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张的新的哲学依据。

陈铨的《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对德意志民族的“理想”、“准确”、“好战”的性格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反对民治主义”、“英雄崇拜”等思想作了精辟的分析,给许多只知沉迷于英美思想体系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另辟蹊径的参照系。他说:“德国人理想中的世界,决不是英法美各国理想中的世界。张伯伦始终没有了解希特拉,他以为对付希特拉可以用对付一般英法美人的手段,所以一误再误。罗斯福也没有了解希特拉,

所以大声宣嚷世界和平。斯大林也没有了解希特拉,他以为德国的国社党运动,是希特拉和少数资本阶级的活动。他们不知道,在希特拉以前,有千百万德国思想家,同希特拉是一样的思想,在希特拉背后,有千万的德国青年战士,同希特拉是一样的性格。这一种思想潮流,庞大的集合力量,下定摧毁征服的决心,其他的民族国家,如果还想保持自己的生命自由,不赶紧于他们的传统的习惯之外另取一种新的态度、新的手段、新的精神,是决没有侥幸的。”^[19]后来的世界史证明:这些话是多么深刻和富有远见!

战国策派言论的出发点和目的,是要“在对照中企图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从而为‘重造民族品德’寻找一条自认为可行的路途。”^[20]沈从文最具代表性。他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21],经过痛苦的反省而达到“民族自存”之目的。他与朱光潜、陈铨都大谈文学与民族,反复强调要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22],以及探寻“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23],使文学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24]和“一个国家民族完整生命的体现。”^[25]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追索与批判,否定孱弱,代之以曾经失落而现已找回的雄强是战国策派共同的理想人格。林同济指出:“抗战的最高意义必定要在那座收复回来的江山之上,培养出一个健康的民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有光有热的文化”^[26]。“抗战的最深入的历史使命,必须烧断了阿Q类型,而铸出一种‘战士风格’!”^[27]这“战士风格”就是那少壮的、向上的、活泼的、充满创造的可能性的敢于向恶势力作无情作战的“力人”品格。这与“京派”文人“重塑民族性格”的理想是完全一致的。

今天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理论水平已非昔比,我们有条件,有能力,也应该在更开阔的社会历史架构中来重新评价这一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综合性文化学派——战国策派,实事求是地加以扬弃。

注:

- (1)林志浩《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
- (2)由反对派的批判文章中归纳而来。为行文方便,笔者将批判战国策派者简称为反对派。
- (3)王新命《文化建设》一卷第4期。
- (4)陈立夫《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建设》,《文化与社会》一卷第8期。
- (5)张申府《五四运动与启蒙运动》,《读书月报》第2期。
- (6)〔11〕陈铨《浮士德的精神》,《战国策》第1期。
- (7)〔8〕〔10〕〔15〕胡绳《反理性主义的逆流》,《读书月报》,1941年二卷第10期。
- (9)《大公报》1942年6月24日。
- (12)冯至《一个对时代的批评》,《战国策》第17期。
- (13)〔14〕甘绍平《启蒙理性·传统理性·非理性主义·当代合理性》,《德国哲学》论文集第11辑第130、131页。
- (16)〔26〕〔27〕林同济《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战国》第19期。
- (17)〔18〕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战国策》第3期。
- (19)陈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战国策》第6期。
- (20)王继志《论沈从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页。
- (21)沈从文《元旦致〈文艺〉读者》,《大公报》1934年1月3日。
- (22)《〈边城〉题记》,《沈从文文集》第七卷第70—73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 (23)《〈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七卷第2—8页,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 (24)《文学运动的重造》,《中央日报》1940年5月5日。
- (25)朱光潜《〈文学杂志〉复刊卷头语》,《文学杂志》1943年7月。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吴章胜)

(上接第96页)

道德律之作为自由的认知理由,两者之间不存在观点上的实质性的矛盾。如果我们把康德的论述理解为一种解释而非严格的证明,或许具有启发意义。这样,原本认为的诸多矛盾和不同之处就会被看成是对问题的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说明。

注:

- (1)〔2〕〔5〕〔7〕《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56—58、105、117页。
- (3)〔4〕同上书第102页,译文参考L·W·Beck英译本 *Foundation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he Bobbs - Merrill Compang Inc. 1959, P63。
- (6)《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1页。译文参考L·W·Beck英译本 *Cnifique of Pracfical Reason*, the Bobbs - Merrill Compang Inc. 1959, P31, 有改动。
- (8)〔9〕〔10〕同上书第6、48、31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林一哲)